

中国对非教育援助政策的话语变迁及建构^{*}

钱旭升

【内容提要】中国对非教育援助作为着眼于长远、互惠双方的全方位一体化的长效对话合作机制，先后经历了给予国际主义援助的政策话语建构、体现公正互惠的政策话语建构和深化能力建设的政策话语沿革。通过梳理发现，中国对非教育援助话语政策体现出指导思想上逐步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援助形式日渐完善、项目援助注重实效、援助构成逐渐形成政府主导高校主体的双边交流体系等趋势。因此今后中国对非教育援助应注意：理念上，以文化软实力作为中国对非教育援助政策话语的基础；内容上，全方位拓展中国对非教育援助话语体系；方式上，注重受援对象主动性发挥的对非教育政策话语彰显；保障上，增强对非教育援助话语体系下的效果的监督评估。

【关键词】非洲教育；教育援助；话语建构

【作者简介】钱旭升，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金华，321004）。

中国对非教育援助兴起于 20 世纪 50 年代，作为“南南合作”典型的中非教育交流在彼此互动中逐渐形成着眼于长远、互惠双方的全方位一体化的长效对话合作机制。语言是思维的表达，政策作为话语的建构，是

^{*} 基金项目：本研究为浙江师范大学 2014 年度“非洲研究专题”项目“中非合作培养卓越教师的实践探索”（项目编号：14FZZX13YB）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通过一定的话语修辞与论证策略对社会‘问题’自身、相关群体‘身份’以及政策方案之‘合理性’依据进行特定建构从而服务于自身意图的体现，而非仅仅是决策者对客观社会问题的直接回应”^①。中国对非教育援助的政策话语，作为一种集体性的语言有效表达，是指中国政府借助一定的外交政策或行为，根据非洲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的现实情况，在教育领域中做出的反应，是集体成员怎样行为的规范性计划。与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教育政策话语不同的是，中非之间不是简单的国与国单一性的教育协作，而是一系列机制性集体性多方对话协商机制，并坚持“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的教育援助和交流。

一 中国对非教育援助政策话语的阶段沿革

中国对非教育援助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深度，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宏观的国际社会背景和自身的战略发展相结合的时代需要。通过对中国对非教育援助政策话语的阶段梳理，我们发现，虽然各个时期的政策主导话语不同，但彼此之间表现出良好的可持续性和完整性。

（一）基于国际主义援助的政策话语建构（20世纪50—80年代）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把与非洲国家和人民建立良好的友谊，支持非洲人民争取国家解放、主权平等和民族独立，视为自己的应尽之谊，也正是在“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者联合起来”（列宁语）的影响下，奠定了这一时期中国对非外交的基本理念和政策。对此，周恩来总理曾专门撰文写道“我们心中不容丝毫忘掉与我们受同样苦痛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弱小民族……我们的救国运动乃必须建立在国际主义上面。”在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出访非洲十国时，周总理反复提及“中非人民有相似命运，是天然同盟者：我们彼此之间过去有‘共同经历’，受殖民主义压迫；今天有‘共同任务’，要独立和发展；未来要‘共同奋斗’，要团结

^① 张海柱《公共政策的话语建构》，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4—5页。

合作”^①。他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我们对外援助的出发点是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支援兄弟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支援未独立的国家取得独立;支援新独立的国家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巩固自己的独立,增强各国人民团结反帝的力量……”^②其具体表现为对非关系的“五项立场”^③和“八项原则”^④。事实上,这同样是国家对非进行教育援助的立足点和发展取向。

文化交流作为国与国之间对话沟通,是阐述各自观点、消除疑虑、增进友谊的重要渠道,其重要的形式之一就是教育合作。中国政府通过向刚摆脱西方列强殖民统治、赢得自身独立的非洲国家提供教育援助,培养人才,改变那里的落后局面,表达了对非教育援助的基本理念。在中非文化交流合作中最早且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埃之间的文化合作。这不仅仅因为埃及是最早与新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更重要的是两国政府在万隆会议上就包括文化合作、经济往来等方面事宜进行的会谈,打开了中非文化交流的大门。两国政府间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埃及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议书》,成为中国与其他非洲国家签订文化合作协议的范本。按照主题词出现的频次及相关的话语变式分析这一文本,最终聚焦在“学术交流”“人才交流”“学校层次”和“人才培养”四个主题词。其中,“学术交流”以“相应的科学机构进行联系”“公认的科学和艺术组织联系”“举办一切种类的图片和艺术展览会”“交换电影演出、书刊等出版物、教育和文化价值的仪器和本”等话语变式出现8次,“人才交流”以“互派语言教师到对方国家任教”“交换留学生”“交换教授和科学家”“访问、讲学”等话语变式出现9次,“学校层次”以“高等学校”这样表述明确的话语变式出现1次,“人才培养”以“互认文凭和学位”的话

① 张象、薛琳《传承和弘扬周恩来的非洲》,载《光明日报》2014年7月30日,第14版。

② 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政府工作报告》,载《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第2版。

③ 具体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310—311页。

④ 具体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辑《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64—373页。

语变式出现 1 次。

对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我国对非教育援助的内容主要是以师生互换为主体的“人才交流”和产品形态为主导的“学术交流”。究其原因，在于刚刚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亟须专门人才帮助其走出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落后的困境；而长期处在被殖民生活，西方列强掠夺下的非洲人民，在实现国家发展中表现出人才、技术和资金的明显匮乏。人才的培养是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对于强权长期压迫的非洲国家。因此，如何培养出服务当地建设的专业性人才，是中非教育合作的主要内容。除此之外，来自视听方面的文化作品，也是久经战火和贫穷之下的非洲人民的精神家园的回归诉求。

而教育合作能够顺利达成的前提条件，是文化合作协议中诸如“双方”“交换”“同等”等显示彼此之间地位平等、互利互惠的词语的频繁出现，这反映了我国对非教育援助正在形成“发展引导型援助”的基本模式。所谓“发展引导型援助”，即在援助理念上，坚持“平等互助、共同发展”；在援助方式上，强调“平等协商、互利互惠”；在援助目的上，致力于“以援助促发展，以发展促合作，以合作实现共同繁荣”^①。通过“发展+引导”的方式，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在实现自身民族解放、人民当家做主人的同时，也在努力承担起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主义责任，即“思考如何在自存与共存、援他与助我、利己与互惠之间寻求适当平衡，对人类现代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②。在这样的思路下，中国对非洲的教育援助与合作注重着眼于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即使在我国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也尽可能帮助非洲国家。另一方面，也再次强调非洲人民的发展方向由非洲人民自主决定，中国只是根据非洲人民的现实需要，提供相应的、无任何附加条件的教育帮助，为非洲发展提供助力。

① 张海冰 《发展引导型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模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96 页。

② 刘鸿武 《对非发展援助与中国国际责任的当代实践》，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2 期，第 3 页。

（二）体现公正互惠的政策话语建构（20 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末）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末，随着中国与非洲大多数国家的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这一时期国际社会的变化对中非教育合作交流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台的“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SAPs）由于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支持非洲实现经济复苏的过程中，还附加系列性政治和经济上的限制性条款，反而进一步加剧了非洲地区的贫困，使非洲债台高筑，从而影响投入教育事业的经费，教育服务提供的机会和质量大幅下降，学生辍学率升高；教育成本分担和回收制度导致了城乡、贫富和性别上的入学率差距进一步拉大；由于教育预算没有增加、货币贬值和控制教育部门工资总额的政策，教师的工资水平也明显下降。^①

另一方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改革开放的路线，在对外交流中我们也致力于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本目标而服务。基于此，中国政府就中非关系的定位，先后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提出“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中非经济技术合作四项原则，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涵盖政治与经济、国际与国内、双边与多边关系的中国对非洲政策“六项原则”，和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互惠、加强磋商、面向未来”的加强中非关系的五点建议。^② 从中非关系的基本原则可以看出，我国这一时期对非外交的主要手段是经济手段，教育援助只是作为促进非洲发展的一种方式。

因此，这一时期对非教育交流的主要特点是将教育援助与培训融合于相关的经济政策中。虽然，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等政策文件所涉及的教育内容表述与之前相差不大，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受援国实际利益的需求，援助方式日益多元。具体来说，中国政府在延续接收留学生的基础上，不断调整非洲来华留学生的学历结构，改变招生方法，即相对缩减来华攻读本科学位人数，增加研究生招生比例；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当地开展人才培养

① 郑菰 《结构调整与非洲教育》，载《比较教育研究》2009 年第 11 期，第 37—39 页。

② 张永蓬 《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非关系发展的特点与成果》，载《亚非纵横》2008 年第 6 期，第 7 页。

工作；通过派遣援非教师、捐赠教学和科研仪器设备、人才培养与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科研等方式，帮助它们发展高等教育和完善学科建设，为非洲国家培养建设需要的专业人才；紧密结合国家资源开发的需要，通过浙江大学（原浙江农业大学）与喀麦隆合作的雅温得第一大学微生物实验室、浙江师范大学与喀麦隆合作的雅温得第二大学汉语培训中心、纳米比亚与东南大学合作的物理试验室和化学试验室项目、武汉大学（原武汉测绘大学）与津巴布韦合作的哈拉雷技术学院测量实验室和计算机实验室项目等一系列科研项目的建起，采用“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模式，积极探索教育面向市场需求的新路，使教育更多地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①

分析发现，通过项目合作制的方式，将教育援助与非洲当地的经济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是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确立起的知识生产要素对非洲当地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主要方式。除此之外，我国对非教育援助正在开始从“人工输血”的单向传递向“半自主造血”的双向互动，在保障人才培养结构合理性的基础上，我国给予更多的是科研上的指导和鼓励，以帮助非洲人民最终能够掌握先进技术，用于解决自身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并由此进一步实践对非教育援助的“中国模式”。

（三）深化能力建设政策话语建构（21 世纪初至今）

步入 21 世纪的非洲发展，由于受到全球一体化思维模式的影响，已经从国别发展的“单打独斗”、“支零破碎”成为跨领域、跨国别之间的整体发展，其中，最显著的标识是成立于 2002 年的非洲联盟（以下简称“非盟”）。非盟成立后，先后发表并通过了非盟《2004—2007 年战略框架》、《非洲教育“二·十”行动计划（2006—2015）》等。在非洲经济发展中，人们也越来越注意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以至于在非盟会议上，人们提出“教育是关键，其绩效直接影响甚至决定非洲发展的质量和规模；教育是非洲开发人力资源、传授适当技能、知识和态度的最主要的途径；再利用非洲现有的资源、实现工业化、参与全球知识经济、为非洲在全球

^① 《中国教育合作和交流》编写组 《中国与非洲教育合作和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42 页。

社会取得应有地位等方面,教育构成发展了新观念、科学技术的基础;非洲要巩固和平的文化、两性平等,形成积极的非洲价值观,也要通过教育这个途径”^①。

与此同时,在中国政府对非外交辞令中,先后提出“中非命运共同体”“正确的义利观”“真、实、亲、诚”等理念,认为双方有“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双方互视对方的发展为自己的机遇,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繁荣。^② 中国政府也认为,通过与非洲进行积极的教育合作与交流来促进教育系统人员、财务、信息、结构各个方面的持续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而且将提升中国价值及其在非洲的影响力。^③

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出,中非坚持在共同的价值观引领下,在合作中促发展,相互包容,共同前进,走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中非教育之间交往的密切、共识的达成和情感的维系,需要自身能力建设的加强予以保障。在中国政府2006年颁布的《中国对非政策文件》中,旗帜鲜明地提出“真诚友好、平等互利、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是中非交往与合作的原则,也是中非关系长盛不衰的动力。”在“合作方式”上,明确提出“确定重点”“拓展领域”“加大投入”“提高实效”,突出反映了中国对非教育援助已经进入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阶段;在此基础上,根据非洲地区的现实迫切需要,抓住重点,落到实处。其中,“加大投入”表现在“设立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适当增加政府奖学金名额”“继续与非洲互派留学生”“继续派遣援非教师”,反映了国家对非洲教育发展进行的财力和人力投入。“确定重点”明确了“教育援助项目的实施”,加强非洲各级各类学校的软硬件建设。“拓展领域”则集中表现在教学内容、学科领域、合作方式的延伸和拓展,如“帮助非洲国家开展汉语教学”,“加强在职业技术教育和远程教育等方面的合作”“鼓励双方教育、学术机构开展交流与合作”,不仅帮助非洲人民确立起创业创新精神和终身学

① African Union. The Second Decade of Education for Africa (2006–2015): Plan of Education. 2006, p. 29.

② 张颖 《中国对非外交新理念及话语体系的构建》,载《光明日报》(理论版)2016年6月13日,第11—12版。

③ Li wang, Internationa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hanging Discours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Chinese Education and Society, 2014, 47 (1), pp. 7–26.

习的理念，更是学会适应如何在社会信息化发展的时代，获得就业机会来满足生活的需要，从而能够做到机会公平。“提高实效”则在于“促进非洲有关薄弱学科的发展”。

2015 年颁布的《中国对非政策文件》，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对非教育援助是在“真、实、亲、诚”的外交理念下进行的，中国对非非洲做到平等互信、务实高效、和谐共处、以诚相待。政策条文将师资作为急需人才进行培养，体现了教师对于一个国家教育发展的重要性，以及非洲优秀师资的极度匮乏。“鼓励地方政府、高校、企业和社会团体设立奖学金”“鼓励双方更多院校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扩大‘中非高校 20+20 合作计划’项目的合作成果”，反映了中非民间教育的参与度和积极性在不断升高，参与的层次和水平也不断拓展，一方面，民间资本的大量涌入，缓解了政府的压力，使得中非教育交流的形式更为多样、更加灵活；另一方面，中非民间教育交流主体从政府机构延伸到高校，对于非洲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和中非之间科研项目的合作研发，具有重要意义。“坚持学用结合，扩大师资培训和职业技术教育合作规模，扩展人力资源开发的途径”，则充分体现了文件的务实性和实效性。

二 中国对非教育援助政策话语演进的趋势

中国对非教育援助作为中非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在变与不变中走向成熟和稳固。中国对非政府的无附加条件援助、彼此间相互尊重、以诚相待的情谊是不变的；变的是对非教育援助政策与时俱进地不断调整。

（一）指导思想逐步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

中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受制于国际社会对新中国成立和发展的敌对态度，提出“五项立场”和“八项原则”。在总的外交政策影响下，中国对非教育援助政策呈现出较为浓厚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色彩，表现出极大的政治优先性。在冷战思维业已消逝，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国际社会新形势，中国政府先后于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提出了对非关系“五点

建议”^①和“命运共同体”“正确义利观”等外交新理念。在这一新思维引导下,中非教育关系“援助”更强调的是一种“合作”关系,形成和发展了中非教育部长级论坛、中非智库10+10合作伙伴计划等机制化平台,旨在彼此双方通过求同存异、共同发展中实现自身能力建设,呈现出多样化、多途径的发展样态,从而实现自主发展的可持续性。

(二) 援助形式日渐完善,注重实效,项目援助为主

项目援助是指援助方以项目打包的方式,将援助资源整体而富有针对性地给予援助对象。中国对非实施的教育援助,严密关切非洲当地现实的经济发展需要,考虑到非洲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中国提供的对非援助以项目模式为主,因为在教育水平落后的非洲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是最为迫切的需求。在实施方式上,基础设施援建一般采用成套项目方式,成套项目分为中方代建或受援方自建的方式。^②中国对非洲的教育援助60余年,经历了受非洲当地政府委托,奔赴实地,提供专家、提供技术和提供资金,负责全过程的中方代建;转向非洲政府在中国政府资金和技术支持下,参与并负责项目建设主体,在实际需求的进一步明确下进行建设的过程,中国政府只是提供相应的建议指导和监管。

(三) 援助构成逐渐形成政府主导高校主体的双边交流体系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埃及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议》到《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北京行动计划(2013—2015年)》,中国对非教育援助是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建立外交关系基础上,增进两国交往、深化两国友谊、谋求共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随着中非之间交流面的扩大和深化,中非之间正在逐步形成以高校之间互通有无为主体的双边交流体系。在政府的政策指导下,高校成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师资培训的主要平台,是中非教育合作的主力军和前沿阵地。我们从“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孔子学院与中国合作学校的协作经营等合

^① 具体参见李安山《论中国对非洲政策的调适与转变》,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8期,第14页。

^② 商务部法律司《对外援助成套管理办法(试行)》,载<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g/201601/20160101243254.shtml>,2015年12月9日。

作项目从筹划走向成熟的历程中可见一斑。

三 建构中国对非教育援助政策话语的思考与建议

通过对中国对非教育援助在不同时期的话语表达内容和方式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时代发展不同,但“好”的政策文本需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并以“渐进式的序贯层递”^①的方式,进行整合与完善。在确保政策话语连续性的基础上,适当根据政治、经济发展需要,增添新的内容或对之前的内容予以调适,在有号召力的新话语感召下,从“观念型文本”转向“行动型文本”。

(一) 理念上,以文化软实力作为中国对非教育援助政策话语的基础

关于文化软实力,学界认为它是特定人类共同体生活的价值系统及其象征形式所呈现的柔性吸引力,是一种实际生存创造力的文化,是具有柔性力量的文化资源,是文化力和软实力的有机结合体,是文化的同化力和认同力。^②就笔者来看,文化软实力是一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经过时间的洗涤所保存下来的力量,通过思想的感召、制度的创新来实现行为的凝聚,并通过一定的方式予以传播,予以推广。文化软实力往往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国家制定的外交政策及相应的外交行为。

在我国,传统文化形成的“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逐渐演变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并通过以诚待人、一诺千金的行为准则和宽以待人的为人处世,得到落实。这一观念也深深影响着我国对外政策,并形成和完善了“和谐共赢”的文化软实力思想。对此,我们可以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五项立场”和“八项原则”,90年代的“六项原则”,直至今天倡导的“正确义利观”,看到它的传承。正是在这一对非外交思想下,我们通过对非进行无附加条件的教育援助,在提升非洲各国教育质量、发展综合国力的过程

① 李钢 《话语·文本:国家教育政策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67页。

② 余伟斌 《中国对非外交政策的文化软实力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2—7页。

中,祛除西方世界大肆宣扬的“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秉承这一基本理念,中国至今已在非洲大陆建立了46所孔子学院,鼓励国内各高校发挥自身优势,选择优秀师资,赴非洲进行汉语教学,并举办丰富多彩具有中国气息的文化活动。高校履行孔子学院章程,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与世界先进文明交流对话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高校在“中国走向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过程中,也肩负着巨大的责任和使命。

(二) 内容上,全方位拓展中国对非教育援助话语体系

综观中国对非洲60年来的教育援助,立足民生,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的外交战略,已经从师生互派、资金投入、基础教育设施援建的初级合作逐渐呈现出多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深度文化合作。例如,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07—2009年)》上,中方明确在“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基础上加大投入,拓展非洲各类人才培养规模、援建农村学校;根据非洲国家需要,在非洲设立孔子学院,帮助非洲国家开展汉语教学,鼓励中国有关院校开展非洲语言教学。在《中非合作论坛——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2010—2012年)》上,倡导实施“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实现中非高等学校的进一步友好往来;启动“中非科技伙伴计划”,进行科技项目研发合作;进一步加大学习学位培养和培训力度。《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北京行动计划(2013—2015年)》则致力于非洲国家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并将其置于非洲国家的优先领域,推动“非洲民生科技行动”,倡议实施“中非智库10+10合作伙伴计划”。

随着合作层次由官方逐渐扩展向民间,中国对非教育援助政策的话语也从单一的发展教育转向以教育为核心,兼具面向文化、传媒、科技等领域的拓展。在《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北京行动计划(2013—2015年)》就曾提到,要进一步扩大中非文化交流“文化聚焦”品牌影响,并在“中非文化人士互访计划”、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加强合作;中非之间围绕优秀电影展播、推进图书出版的翻译、印刷和出版等项目;开展“非洲民生科技行动”,实施联合研究与技术示范项目,接收非洲科研人员来华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鼓励与非洲国家的知识共享和先进

适用技术转让,提升非洲国家科技创新能力。^①

(三) 方式上,注重受援对象主动性发挥的对非教育政策话语彰显

随着中国对非教育援助的内容多样和深入,中国对非洲的教育援助的方式也在此从“授人以鱼”向“授人以渔”转变,反映了彼此之间理解互信基础上的深层对话,所带来的也是交流方式的全面性。合作的基础也正在从满足生存需要的物质层面交流发展到理念层面的精神交往。可以说,在由人员、财务、信息和结构组成的中非教育交流合作和对话系统中,政府奖学金、短期培训、学校援建、孔子学院、教师借调以及高校合作等方式,所起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②

这种转变的背后,是中国政府不断认识到,对非教育援助只是促进非洲当地发展的助动力和催化剂,真正实现非洲发展的还是非洲人本身的认知觉醒和能力提升。因此,中非之间的合作和交流项目,在本着促进非洲当地发展的基础上,以行动的方式写入政策条文中(如《北京行动计划(2013—2015年)》中的“非洲民生科技行动”)予以落实。与之前相比,中国对非洲发展,在援助的基础上,更多的是鼓励和支持,而非之前的“大包大揽”。

(四) 保障上,增强对非教育援助话语体系下的效果的监督评估

“教育援助的有效性分析必须从中非合作的基本原则与立场出发,在‘中非合作论坛’的综合框架内思考援助对中非双边所产生的影响和效益。”^③中国对非教育援助取得怎样的实际效果,一方面,是看是否满足了非洲作为受援国的实际需求,是否有利于帮助非洲国家解决本土实际困难和问题;另一方面,是看援助方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是否做好相应的顶层设计,是不是在符合中非合作发展方向的基础上,为人民谋福祉,满足普通民众的希望。

① 《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北京行动计划(2013—2015年)》,载 <http://www.focac.org/chn/ltida/dwjbzzjh/hywj/t954617.htm>. 2012年7月23日。

② 滕珺等《中国:一个新兴教育援助国的历史基础与未来挑战——基于“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的批判性文献分析》,载《比较教育研究》2016年第1期,第22—23页。

③ 牛长松《基于教育援助有效性视角的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评估——喀麦隆的个案》,载《比较教育研究》2011年第12期,第45页。

就目前来说,我们看到,中非合作论坛,作为 21 世纪中国和非洲国家的主要集体对话机制,通过定期的部长级会议、外长级会议以及使团磋商等方式,保障中非对话的务实,并在每一次论坛会议结束之后,都会颁布政策文件,作为行动纲领,对中非合作予以规范。但是,我们认为还需要进一步增强将民间力量作为第三方评估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并实现监督评估的全程参与,即“不论是实施援助非洲项目,还是举办专业研修班,都要不断完善援助非洲过程中的竞争机制、评估机制、激励机制和辐射机制”^①,并形成相应的教育问责机制。

(责任编辑:王珩)

The Discourse Transformation and Construction In Educational Aid Policy From China to Affrica

Qian Xusheng

Abstract: The educational aid from China to Affrica has become a whole round long-acting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 this long-term project has benefited to both sides, this policy discourse construction has gone through three process, which is international aid, reciprocity and fairness, strengthening capacity building. Through the analysis, the educational aid discourse policy from China to Africa has some features, such as the guidance ideology gradually tends to get rid of the ideological shackles, the form of the protect assistance has become perfect, focusing on effective assist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ssistance gradually tends to a bilateral system that the government direct it and the universities are subject. Therefore, the aid project will improve in some aspects. In theroy, culture soft power will be the basis in the educational aid discourse policy; in content, we have to expand the educational aid discourse

^① 张秀琴等 《中国和非洲国家的教育交流与合作》,载《西亚非洲》2004 年第 3 期,第 24—28 页。

system; in manner, focus the influence on the initiative behavior of recipient objects to the expression of discourse policy for educational assistance to Africa; in security, increase the effects on supervise and assessment under the aid discourse system.

Keywords: African education; Educational assistance; Discourse Construction